

科举交往史：由关系视角下移的科举史

赵 凯

【提要】 科举交往史是与科举交往活动相关的历史,是不同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新领域。从学术源头上看,它是科举活动史的重要分支,也是对科举活动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科举交往史研究从“具体人物”入手观察“多彩世界”,试图追寻科举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联。展开科举交往史研究,在网络搭建上,应编织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网络,回归科举交往场域;在史料搜集上,应注重多元化的史料来源,树立大史料观;在方法选取上,应突出问题取向,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语言表现上,应采取叙事的表达方式,增强文字的可读性。科举交往史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内容,完善科举学的研究体系,也有助于从历史反思现实,为当今社会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科举学 科举交往史 科举活动史 关系 视野下移

科举交往史是由关系视角引入的科举史,从源头上看,它是科举活动史的重要分支,也是科举学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它强调回归科举人物的交往生活,立足交往主体的人际关系网络,梳理他们与网络内不同对象的交往过程,呈现鲜活的科举活动场景。研究科举交往史,既是深化与拓展科举活动史研究畛域的重要实践,也是顺应学术视野下移趋势的应然之举,有利于触碰“制度”和“思想”的深层内因,完善科举学的研究体系。厘清科举交往史的概念意涵,了解其内在价值,明确其研究方法与表现形式,对深入推进科举交往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交往及科举交往史的基本内涵

探究科举交往史的基本内涵,首先需要理解“交往”的含义。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交往是历史生成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根底。雅斯贝尔斯认为,“交往”即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人类存在无所不包的本质”。^②个体不仅具有独特的意识,而且是社会的存在,因此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③马克思、恩格斯将交往划分为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并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活动,与人物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交往是关系性与活动性的融合,物质交往是其他形式交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 卡尔·雅斯贝尔斯:《理性与生存——五个讲座》,杨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6页。

③ 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往的前提和基础,交往与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范畴具有内在统一性,交往活动的本质是实践活动。哈贝马斯在继承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将言语行为当作交往行为的出发点,并进一步指出:“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①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建立在话语沟通上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交往得以可能的根本要素,交往双方以生活世界为交往场域,在特定的沟通情境中以语言为交流媒介,以行动的合作化与个体的社会化为最终鹄的。

尽管不同研究者对于“交往”的理解存有差异,但总的来看,“关系性”是这些理论中“交往”概念的共同特征。作为社会领域的特有现象,交往是不同主体以促进个体发展、改造客观世界为宗旨而展开的互动、交流、商酌、学习、合作等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各主体依凭“关系”的内在缔结彼此影响、相互作用,进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社会变革。正如邓小南所言,各类关系与制度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转的实际曲线,强调活动中的“关系”,在活动场景中,将制度、社会氛围、文化环境、人物思想等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便赋予抽象事物以蓬勃的生命力。^②在社会关系的形塑下,不同主体的社会角色通过交往活动渐趋稳固或逐步更迭,他们编织的关系网络随着交往对象的变化处于持续运动的态势。因此,人际关系与交往活动构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勾连状态:一方面,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交往双方改造客观世界、实现自身发展等活动的产物,是在交往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推动交往活动得以进行的“催化剂”,能够引导实践主体与关系网络中的其他对象展开相应的交往活动。在“关系性”范畴中,任何交往活动无不体现出交往者之间物质、情感、思想等方面的内在相连性,这是交往活动“社会性”与“实践性”本质特征的应有之义。

明确了交往的概念后,便可探讨科举交往史的基本内涵。所谓科举交往史,顾名思义,就是有关科举的交往活动史。从广义上说,科举交往史涵盖了一切正式的科举交往活动与非正式的科举交往活动,包括科举士子因学知求教、备考应考、应酬交游等事项与亲友、同学、业师、座师、房师、同年等的交往活动,统治阶级围绕科举政策制定、科举内容改革、科举经费筹拨、科举人才选拔、科场案件处理等事项与政府官员进行的交往活动,教师群体针对日常教学、作业批改、成绩考察等事项与学生、同事间的交往活动,学校行政人员围绕日常管理、经费使用、后勤服务等事项与师生群体、政府部门的交往活动,考官围绕命题、监考、阅卷、张榜等事项与其他官员、科举士子的交往活动内容。狭义的科举交往史仅指考官与科举士子围绕科举考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交往活动。

从学术源头上看,科举交往史属于科举活动史的范畴,而科举活动史又是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刘海峰在《“科举学”刍议》中正式提出“科举学”的概念,认为科举学是一个“内容广泛、包罗宏富的专门研究领域”,从理论上建立科举学,能够“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原来各学科的独立研究更加全面、更为深化”。^③2005年,刘海峰出版了专著《科举学导论》,对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等作了钩玄提要的论述,指出科举学作为研究科举的“综合性专学”和“多学科研

①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②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③ 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究领域”,应当包括科举活动史、科举制度史与科举思想史(或科举观)三方面的研究。^①

从现代系统论的视角来分析,科举活动、科举制度和科举思想三者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紧密联系。人类活动从自发行为转向自觉行为时,人们在脑海中会产生如何“生存下去”“过好生活”的想法,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想法进一步凝练为指导活动的思想观念。统治者在一定观念的影响下,为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便制定了规范实践活动的社会制度。隋朝以降,作为选才取士制度的察举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统治者在反思制度运行状况的基础上多方谋虑,科举制最终应运而生。进入科举社会,科举制在实践活动中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统治者在科举思想的指导下将改革方案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引导实践主体继续投身科举活动之中。如此看来,科举活动是科举思想与科举制度产生的前提,当科举思想在科举活动中“破壳而出”,并以科举制度的形式固定化时,科举活动就成为连接科举制度与科举思想的纽带和津梁。在整个科举系统中,科举思想与科举制度是科举活动的表现形式和衍生内容,当它们形成以后,又会反过来指导科举活动的开展。因之,科举活动、科举思想和科举制度是“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②科举史正是在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从活动属性上看,科举活动可以分为交往活动与非交往活动两种类型。科举交往史作为科举活动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重点研究实践主体与其他对象产生互动往来的科举交往活动,它承袭了科举活动史的基本特征与运行机制,与科举思想史和科举制度史同样形成了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科举思想的孕育与科举制度的形成离不开科举交往活动,“只有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才是‘惟一的真实’”;^③另一方面,科举交往活动是在一定的科举思想与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进行的,研究科举思想和科举制度需要紧密关注它们的实践情形与运转状况,“国家、制度、市场等只有放在这些交往和相互影响当中来考察才有意义”。^④以往的科举活动史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各类科举活动本身的介述,或聚焦于某一科举人物、某类科举人物,考察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活动类别,更多的还是立足研究对象本身,探究他们的非交往型活动,聚焦于交往场景与交往细节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⑤相

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9页。

③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⑤ 目力所及,除下文提到的研究成果外,有关科举交往史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有以下内容。1. 对单个人物科举交往活动的研究,如王健:《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张廷济日记〉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张宏波:《张惠言京师交游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李莉:《宋季科举社会视角下的姚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丁修真:《明初科举小史:洪武六年郑真赴试事迹发微》,《史林》2021年第6期;等等。2. 对群体人物科举交往活动的研究,如黄云鹤:《唐朝下层士人社会交往特征及其心态》,《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平田茂树:《从小说史料看宋代科举社会的人际结合》,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54页;梁建国:《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兼论门生关系的生成》,《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王逸之:《多元互动:宋代儒士与术士的交际活动》,《史志学刊》2019年第1期;张延昭:《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3. 对重大科举事件中各方交往活动的研究,如白金杰:《明代科场案与明代政治——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陈文新、余来明主编:《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11页;朱子彦:《唐代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科举学论丛》2017年第1辑;叶鹏:《明清学额制度之基层运作——以十七、十八世纪福建莆田、仙游两县学额争端为中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8期,2020年6月;金星:《清绍兴周马姻亲交游与1893年“科考案”的发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等等。

较于科举思想史、科举制度史和非交往型的科举活动史,科举交往史研究更加注重从交往主体关系的角度进行过程性的描述与分析,如决策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对科举政策出台的影响,科举士子与授业恩师之间的学缘交往对个人成长的潜在效力,科举士子与同窗好友间的密切沟通对学术水平提升的作用等。它既丰富了以往科举活动史研究的内涵,也是科举学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它的引入使科举学的研究视角更为多元,让历史上活生生的“社会人”走进了科举学的研究视野,为科举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很好的启迪。

科举学的内在属性决定了科举交往史研究的“跨界特征”。刘海峰指出:“科举不仅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这些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而且与地理学(主要的人文地理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中外关系史学,甚至军事学相关。”^①因之,追根溯源,科举交往史是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交叉而成的研究领域。科举交往史研究的开展应充分把握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不同学科中汲取服务于自身发展的养分。

从历史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研究呈现的是历史上不同主体交往活动的具体场景,它以“人际关系”为切入方式,将与人相关的内容通过交往活动呈现出来,给历史注入了炽热的血液。它不仅注重研究帝王将相、政府要员、科举精英的交往活动,而且将眼光瞄向了普通科举士子的日常生活,正是数以亿万计平凡士子的交往画面,才凝聚成科举历史的壮阔图景,它是“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②也是“以人为本”研究思想的纵深拓展。

从政治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可以研究皇家贵族、同年、朋党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之间围绕选拔官员、维护统治、制度革新等进行的交往活动,借助关系网络中的种种线索,建构政治交往场域的生动场景,更加深刻地体知科举制度与政治生态的紧密联系。如,探究清朝中叶政府处理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件时各方交往的过程,能够看出为减少土著绅士和棚民绅士矛盾而出台的相关措施,背后体现着维护政治稳定的鲜明意图。^③

从教育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可以研究科举士子、授业恩师、同窗好友、主考官员等围绕学知、传教、应考、监考、管理等展开的教育交往活动,通过视野下移,回归基层的、日常的、微观的“原生态”场面,重现充满生命力的教育历史画卷,探讨教育交往之于士子成长、教师发展、学校运转、教育改革等的内在影响,体知科举、教育与交往活动的深层联动。如,研究科举士子求学备考期间与授业恩师的互动交流过程,能够深入发现师承是如何影响士子的知识水平、文化素质与思想观念的;研究学官与同事的商讨沟通过程,可以发现教学方法、管理措施等是如何实现变革的。

从经济学的视角,科举考试的运作与推行需要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接受教育与科举应试离不开金钱的支撑。科举交往史研究可以分析由科考活动而引发的各类经济交往行为,如士子学费、科考路费、买通关节费、考官差旅费、考试印制费、考场修理费、考试劳务费、考试赏赐费、制举用书刊刻费、贽仪等各类费用在筹集、分配、花费等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交往活动,从中探察科举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动因。

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5页。

② 周洪宇:《教育生活史:教育史学研究新视域》,《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③ 谢宏维:《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从文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可以探究以科举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试贴诗、论、律赋、八股文等)和文艺作品(诗、词、戏曲话本、小说等)的创作过程,关注这些作品的作者与周围人士的交往互动情况,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品间的联系。如,系统梳理吴敬梓的社会交往网络,通过考察各种交往活动,探究他与嗣父吴霖起,妻子陶氏、叶氏,其他亲属、族人、友朋等的微妙关系,从《儒林外史》中透视其交往网络背后的人生百态。

从社会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地位人物的科举交往活动,剖释交往主体的社会身份、阶级分层、资本累积等因素对他们交往偏好、交往方式、交往观念、交往性格等的影响,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分析“科举架构”下社会组织的运转机制,透视科举社会的多样样貌。

从地理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研究可以描绘解额、南北卷、分区定额等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各地区为维护自身权益与朝廷和其他区域的博弈、交锋过程,探察冒籍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以及冒籍防范(惩治)者之间的商讨与治理过程,细致分析不同地区考生的利益冲突。

从军事学的视角,不少举人和进士撰写过军事著作并成为武官,特别是武科举制度选拔出了许多能写兵书、战功彪炳的军事将领。科举交往史研究可以考察这一群体在武举过程中与他人的交往行为,探究他们与不同主体进行的军事交往活动,总结科举对军事的影响。

从人类学的视角,科举交往史研究将逻辑起点复归到“人”,通过对语言、风俗、客观环境等的分析,把握主体间交往活动的发展轨迹,发掘科举人物“在群体生活中所创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①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如此细化研究角度,不同部分之间或有重合,但均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属性,通过重现不同人物科举交往活动的历史场景,总结交往活动的基本特征与现实影响。

二、科举交往史研究的价值指向

科举交往史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科举学研究,它强调从关系视角关注实践主体的交往活动,追寻科举与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科举交往史研究在视野下移的基础上增添了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内涵,有助于完善科举学研究体系。立足实践,把握科举交往活动与个体成长、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吸取可资镜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今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坚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体现人文关怀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高度强调人的主体价值,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通过实践活动,人们得以理解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并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实践活动作为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一开始就是社会地进行的,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总是社会的人即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实践的过程就是

①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社会的人协同动作以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① 马克思在批判专制制度压制人性的基础上,高呼“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②倡导人们通过交往实践,最终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交往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主体的本质力量得以现实化、客观化”的关键因素。^③ 在各类科举交往场域中,实践主体与其他对象建立起“双主体”的交往结构,体现出主体间性的内在特质,这种于交往过程中渐次丰盈的生活世界,昭示了科举交往者的主体属性和社会属性。

回溯以往的科举学研究,在注重科举制度、科举思想等“理性史”的同时,以鲜活具体的交往活动为中心的科举历史相对受到研究者的忽视。然而,“离开人的活动来谈历史,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可言。”^④因此,研究者应回归生活世界,关注体现科举人物生命价值的多彩交往活动。科举交往史研究关注人的生活性、实践性特征,将目光聚焦于科举交往活动的动因、过程及结果,把实践主体的感性活动当作历史存在的原生状态,试图还原交往场域中活生生的人参与科举活动的生动场景。在关系网络的牵引下,通过分析交往主体的言谈举止与情感世界,探察交往活动之于个体发展、社会变迁的内在价值,以此解读科举人物的百态人生。这是坚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立场,重视“以人为本”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展现了对科举交往主体的人文关怀。

(二) 丰富科举活动史研究内容,完善科举学研究体系

三十余年来,科举学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主要还是聚焦于“科举制研究”和“科举学体系及科举专题内容”两大方向。尽管科举专题研究也有部分关于科举活动史的成果,但又以科举教育观、科举人物思想、科举文学等方面的内容为主,难以与浩如烟海的史料情况相称。^⑤ 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科举活动史在科举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开始重视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工作。如,刘海峰指出,“科举活动史是制度实际运作的历史,而思想史则与考试制度的产生、演变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三方面是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并针对“科举研究较偏重制度方面”的情况,呼吁对科举活动史进行专题研究。^⑥ 李木洲强调,科举学应超越传统的二分史观,“形成‘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科举活动史’齐头并进的三维研究体系”。^⑦

科举交往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科举史,展示的是实践主体在交往活动中生成的“有人味”的科举史,它在视野下移的基础上细化了科举活动史的研究,是对原有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赋予科举活动史研究以新的活力。科举交往是科举活动的重要内容,科举交往场景自然也成为科举活动中最灵动、最鲜活、最真实、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各类科举活动的发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主体正是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践行着内心的想法与信念,他们的思维与认知也在他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稳定的概念系统。从这个层面来说,科举观念的形成与更新、科举制度的问世与实施,都离不开科举

① 陈晏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③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④ 赵磊、赵晓磊:《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抑或历史目的论》,《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苑津山:《30年来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1期。

⑥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29页。

⑦ 李木洲:《科举活动史:科举学研究的新维度》,《湖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交往活动,故而研究科举活动史,不能不研究科举交往史。转换研究视角,立足主体间的交往过程探讨具体的科举活动,既符合科举学“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经典向世俗、从中心向边缘”过渡的趋势,^①能够帮助科举学“从‘理论话语’到‘活动话语’、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视域’、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叙述’、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等一系列研究理念以及研究方式、方法的改变”,^②也是丰富科举活动史研究内容,完善科举学研究体系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摆脱当下科举学面临的发展困境。

(三)由“具体人物”观察“多彩世界”,追寻科举与人类生活的关联

不同于传统的长时段、宏观性、抽象化的研究范式,科举交往史研究在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同时,更加主张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取向,它不仅考察历史舞台上的精英人物,而且将眼光投向了一般大众,关注普通科举士子的日常交往行为。科举交往史研究以“具体对象的具体交往活动”为研究重点,从日常的科举活动入手,关注历史上具象的、易于观察的科举交往事件,通过聚焦研究视野,放低研究视线,扩大研究对象的“分析参数”,更加直观、更为全面地体知历史主体绚烂多彩的生活世界。强调缩小研究范围,关照科举场域中的“具体人物”,并不意味着孤立地研究人物的交往活动本身,而是要从“具体人物”观察“多彩世界”,通过对“活”的人物的交往活动的详细分析,探察各人际关系链条中科举交往者的不同表现,对交往主体形成全面的认知。以此为基础,从一个侧面窥视一个家族、一个村落、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概貌,更好地贴近历史现实,以达到“从小看大”“见微知著”的研究目的,这也是微观史学中“借助一个缩影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的方法在科举交往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③为发现历史、认识历史“重新恢复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④

历史是仍旧活着的过去,要深入解析科举制度、科举思想的丰富意涵,就应复归彼时的交往场域,回望故人的日常生活,体察交往活动背后隐藏的各类信息。通过感知实践主体的科举交往世界,研究者能够搭建起科举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联,对科举系统中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形成直观的体认,这种方式克服了忽视历史主体“人”的研究,从而“使历史失去了丰富多采、鲜活生动的内容和面貌”的弊端,^⑤避免了宏观研究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缺陷。科举作为隋唐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⑥与普通士子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各类交往活动,特别是文化交往活动,都深受科举的影响。立足特定的历史时空,将研究视角转向具象的交往主体与特定范围的社会群体,在科举学的显微镜下,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摹以及交往事件的周密分析,富有逻辑、生动鲜活的生活场景便可直观地展现出来。由此,我们能够深刻地感知科举、社会系统和科举人物日常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物生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① 周洪宇、中国昌:《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② 李木洲:《科举活动史:科举学研究的新维度》,《湖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③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x.

④ Donald R. Kelley, “Book Review”,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37, No. 2, 1984, p. 254.

⑤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⑥ 刘海峰:《唐代福建进士考辨》,《集美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四)从历史反思现实,为当今社会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①历史研究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它在回溯过往的同时,还能对当下社会予以关照,具有强大的现实服务作用,科举交往史研究同样如此。科举时代一帧一幕的交往场景已成陈迹,但不同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至今彪炳史册。如果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科举学注定要陷入窘境,甚至会走向衰落。^②时至今日,社会改革与发展需要从科举交往史宝库中汲取养分,通过对往昔科举交往活动的挖掘,为当今社会的革新提供镜鉴,真正做到鉴往知来、由古通今。与此同时,科举交往史研究还将目光投向远方,使过去、现在、未来以“各自的光亮互相映照”,^③共同把握时代脉搏,为未来事业的规划与部署贡献智慧和力量。

以教育学视角为例,科举交往史是现实教育改革,特别是考试改革可供参考的最直观、最丰富的历史资料。通过探究科举场域中普通士子、教育官员、教师群体等实践主体的交往活动,总结其外显特征及内隐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内在观念、家庭状况、生平经历、身份地位、社会现状等因素与交往活动的双向影响,进而把握科举交往活动与个体成长、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以之为阶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科举思想缘何而起,科举制度因何而生、为何而改,并对一千多年来的中国科举发展史形成清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为当下与未来教育场域中各类交往活动的具体开展提供源自历史的智慧,“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教育考试改革与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④

三、科举交往史研究的展开方式

科举交往史研究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它在网络搭建、史料搜集、方法选取、语言表现等方面应有立足自身的展开方式。在网络搭建上,应编织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网络,回归科举交往场域;在史料搜集上,应注重多元化的史料来源,树立大史料观;在方法选取上,要突出问题取向,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语言表现上,应采取叙事的表达方式,增强文字的可读性。

(一)网络搭建:编织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网络,回归科举交往场域

“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⑤当研究者把实践主体“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链条汇总起来,以整体性思维理顺不同链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链条就成为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际关系网络。科举时代,科举人物在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志缘等因素的牵引下,与其他交往对象形成了亲人、同乡、同学、师生、同年、同官、上下级、挚友等身份关联,由此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既能为身处其中的交往者提供经济资本、文

①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② 刘泽华:《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人民日报》1998年6月6日。

③ 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④ 刘海峰:《科举学的教育视角》,《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⑤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影响着他们科举交往活动的开展状况。故而,深入推进科举交往史研究,需要将科举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建构思维的基本工具,细致分析网络中各关系链条间有无交集,是否“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而正确评估人际关系网络在科举人物不同阶段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与功能。

由于科举文献与科举人物数量众多,科举交往史研究可以借助数据库来构建科举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研发出一些人物数据库或科举学方面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对于深入科举交往史研究大有裨益。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是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台北“中研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建设的全面汇总历代人物生平信息的关系型资料库,截至目前已收集了53.1万个人物的传记资料,其中涵盖了众多的科举人物。CBDB将分散的历史记录加以整合,收集了大量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数据,它在呈现科举人物基本信息的同时,支持不同对象之间关系链条的查询,并能通过可视化功能绘制科举人物的关系网络图,揭示网络内成员之间的关联。由浙江大学龚延明主持建立的“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收录了十余万条进士信息,包含进士人物的姓名、籍贯、出身、登科、职官等内容,为再现历代进士的人际关系结构提供了极大助益。类似的数据库还有“中华科举库”“明代武举数据库”“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等。随着数字化史料的增加和发展,研究者对科举人物关系网络的构建会更加便捷,服务于科举交往史研究的数据库也会逐渐增多。

需要警惕的是,作为状态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作为过程的“交往”,“关系”的内在效力需要在具体的交往活动中得以展现。数据库尽管可以帮助研究者编织科举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但它“不能代替我们进行问题分析和历史解释”,^①要解释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变化、为何变化,理解它作用于科举人物日常活动的内在机理,还需从关系网络入手,分析科举人物与网络内其他对象具体的交往活动。日常生活中纷繁多样的科举交往活动都是以关系网络为根蒂在林林总总的交往场域中进行的,这些交往场域“在经过各种各样的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流过程以后”,会衍生出“政治的、社会的秩序等所谓社会的构造”。^②历史是具象的历史,每一个交往场域都是在时间、地点和其他外部条件制约下形成的特定空间,在分析科举交往活动时,应以甄别的眼光探寻不同场域的特征,考察场域内政治形态、同乡意识、家族观念、科考理想、利益分配等各类因素的催化作用,而非“将分析范畴过分地普遍化”,忽略“深入探索区划和分层的社会历史建构”。^③将科举交往场域内的各要素排列于思维框架中,用更加广阔的视野洞悉阐发场域内的科举交往活动,从而还原与再现立体的、丰盈的、有灵魂的科举交往历史。

(二) 史料搜集:注重多元化的史料来源,树立大史料观

“史料者,乃历史知识之来源也”,^④缺少史料的历史研究,正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真实、

① 包弼德、高旭东、尹倩:《包弼德:数字人文要配合学术思考》,《数字人文》2020年第4期。

② 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③ 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④ 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全面地重现历史的原有面貌。只有以准确、可靠、丰富的史料搜集为前提,历史研究才有可能得出科学、有效的结果。因此,科举交往史研究应树立大史料观,充分吸收前人流传下来的各类史料,注重史料来源多元化。

第一,应注意对官修文献的深层挖掘与系统分析。官修文献包括正史、纪事本末、政书、史抄、史评、载记、官方档案等类别,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历史演进的整体脉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进行科举交往史研究,应对官修资料进行细致考察,通过分类总结、比对参照,系统梳理史料中记载的各类科举交往场景,对科举政策的诞生与推行过程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如,利用朝廷上谕、官员奏折、衙门电报等官方档案,辅之以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再现朝臣和东南督抚在辛丑乡试展期问题上的博弈过程,可以发现这场论争既反映了清廷在求稳与求变之间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初始“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也说明当局在乡试问题上的决策受到东南督抚的严重限制。^①

第二,应强调对民间文献的广泛搜集与充分利用。官方典籍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官员名士等精英人物,导致普通科举士子成为“沉默失语”的群体,且官方文献大多具有“事多隐讳”“语焉不详”“呆板枯滞”等弊端,^②很难详细记录具体的交往情景。面对这种困境,研究者应搜集与利用日记、笔记、信件、类书、自述、野史、报刊、小说等非官方文献,特别要重视交往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通过考证、辨析、整理与汇总,从这些底层资料中探寻有意义的小点,挖掘科举人物生动鲜活的交往细节,再现交往活动的鲜活图景。如,以魏大中著《藏密斋集》为主要素材,通过梳理魏大中考中进士前的科举交往活动,分析其科举关系网络形成与扩展的内在机理,能够发现关系牵引下的社会交往对举业成功具有积极意义。以此为引子,透过宏富广博的民间文献,深入探察普通士人的科举生活与社会交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社会士人的权力关系。^③

第三,应重视对实物史料的整体筛查与细致考究。实物史料指历史主体的活动场所及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有形物品,大体可分为遗址、遗物、墓葬等类别。遗址和遗物是科举交往活动发生的原始现场和科举交往活动展开的物质载体,有助于构筑科举交往活动的真实情境,增强研究者对于科举交往历史的实感性。墓志等实物史料记录了墓主的生平事迹与交往情况,对弥补纸质资料的不足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整体筛查与细致考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文献资料,研究者可以更好地把握交往主体的性格与偏好,品味科举人物的多彩人生。如,以唐代进士所撰墓志为中心,通过梳理史料背后的交往细节,可知唐代进士举业前后的交往活动主要围绕知识、权势和财富三大要素展开,交往对象的选取受科第目的的直接推动与自身身份的牵制。^④

(三)研究方法:突出问题取向,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文明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大都需要在方法和工具中去寻找”。^⑤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① 韩策:《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周洪宇:《学术新城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③ 冯贤亮:《晚明乡村士人的科举生活与社会交往——以魏大中的坐馆与举业为中心》,《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

④ 刘琴丽:《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61页。

⑤ 张康之:《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其器”,选取与研究问题相匹配、相适宜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研究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科举交往史研究除坚持历史考证法、文献分析法等一般研究方法外,还要重点关注以下两点。

一是重视问题取向与批判意识。与传统的“体系建构”取向不同,问题取向秉持的是问题逻辑,它主张从重大现实问题入手来研究历史,将问题的发现、提出、处理作为基本的研究路径,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对特定问题形成深刻的认知。正如布洛克所言,文字史料如同见证人一般,“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①因此,科举交往史研究应重视问题取向,树立问题意识,围绕“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的整体思路,^②重点关照当今考试政策下教师交往、师生交往、生生交往所反映的各项问题,通过回望科举场域中利益相关者的交往画面,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解,从历史场景中寻找当下问题的答案与线索。同时,研究者应带有批判性思维,破除对权威的盲目笃信,通过比对与考究史料,加之合理的推演与想象,复原合理、真实的科举交往场景,拓展整个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应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是当代史学的基本特征,这种学科间的整合意味着历史研究应跨越传统学科间的藩篱,与其他学科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融会与沟通。^③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交往史研究需要吸收各类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借鉴微观史学的“提名法”“证据范式”等方法模式为例,科举交往史研究可以从科举交往活动的当事人出发,将研究对象聚焦到有血有肉的个体,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进行精准搜索与交叉引证。在此基础上,将各类典籍中分散、琐碎、不完整的资料整合起来,编织科举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梳理实践主体在不同交往场域中的离合状态,复原他们的生活迹象与内心情感,借此分析影响科举人物交往活动的多方因素。如,孙继通过比对与梳理诗歌、辞赋、散文、年谱等多种文献,建构了北宋进士秦观应举期间的科举交往网络,并对不同场域中秦观的交往活动进行了细致论述。在分析秦观交往动机与交往特征的基础上,作者以小见大,从人脉关系、交往类别、资本积累等方面详细总结了北宋中后期普通举子的应举样态。^④

与此同时,科举交往史研究要实现纵深发展,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优点与长处。例如,可以借鉴心理学的心理分析法。科举与科场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不仅深刻影响了普通士子的认知态度、情绪体验与意志品格,还对考官情感世界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时代,绝大多数普通士子将读书应考作为改变命运的重要手段,因此,从备考到赶考再到放榜,紧张、疲惫、焦虑、期待、兴奋、失落等各种情绪在普通士子的身上交织出现,并在交往活动中显露出来。与此类似,考官入闱前后的心态变化,也通过与其他对象的交往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采用心理分析法,深入感知特定历史情境下交往主体的内心思想与复杂情感,通过身体与心理的双向互动,考察科举

① 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② 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③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④ 孙继:《北宋中后期举子的科举交游网络——以秦观应举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1—59页。

考试对举子与考官“知情意行乃至个性之影响”,^①更好地把握与诠释交往活动的发生机理和本真意图,为深层分析交往活动提供支持。如,举人身份助力左宗棠立身扬名,但也使其建功立事之路颇为曲折,这导致了他既自信又自卑,既认同又无奈的个性心理。复杂的科举心态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又通过具体的交往行为表现出来。^②此外,科举交往史研究还可以借鉴类比研究法、计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使其服务于自身的研究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方法并非越多越好、越新越佳,研究者应做到视具体情况而定,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为研究内容服务的目的。

(四)语言表现:采取叙事的表达方式,增强文字的可读性

近年来,随着叙事史学的不断发展,以“叙事性散文话语”讲述历史场景的研究成果日渐涌现。^③不同于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的研究惯习,科举交往史研究更偏重于考察实践主体科举交往活动的动态过程,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应该更多地采取叙事的表达方式,突出研究成果的生动性与可读性。传统的宏大叙事内含整体性、普遍性、全面性、结构性等特征,它如同一个捕鱼的大网,尽管能够捕捉到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最普通、最广大的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却被遗留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在关注宏大叙事的同时,科举交往史研究要善于利用“日常的或者自然的语言来描述它的研究对象”,^④更多地通过日常叙事的方式,将科举人物的交往活动和日常体验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突出叙事语言质朴、简洁、真实等特点,使普通民众“读得懂”“理得透”,都“可以读,也喜欢读”,^⑤凸显文字本身的生命力。

科举交往史研究还应通过“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将微观与宏观有机融合,^⑥重绘科举人物的人生,在此基础上反映日常生活的真实境况,揭示交往活动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⑦由此形成的科举交往画面是充满生活气息、具有人情味的画面,才能真正实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见水滴又见海洋”的目的。胡海义的著作就是一个示范。他使用生动鲜活的文字,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了古代小说中科举士子苦读、应试、放榜等阶段的交往细节,描摹了他们的人生追求、状元情结和心理状态,展示了一幅传统社会普通士子的科举生活画卷,使读者能够更为直观地认知各类科举交往活动与人物生活的关联。^⑧

结 语

时至今日,“科举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专学,已从一株幼苗日渐成长为大树,朝着“体系完

① 刘亮:《科场与人心:士子科举心理研究发微》,《大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6期。

② 吴四伍:《举人身份与科举心态研究——以左宗棠为个案的考察》,《中国考试》2013年第5期。

③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④ 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

⑤ 刘海峰:《文字会影响健康吗》,《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6日。

⑥ 王超群:《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

⑦ 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⑧ 胡海义:《古代小说与科举》,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整、逻辑严密、经得起人们推敲或质疑”的目标不断前行,^①开展科举交往史研究,正是使这棵大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必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倡导加强科举交往史研究,并非意味着忽视科举制度史与科举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希望通过探索不同人物的科举交往过程,打通活动、制度、思想之间的关系,对科举时代的人物生活与社会运转形成更好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举交往史是科举学的一个研究维度,更是以关系思维回望整个科举史的一个独特视角。科举史画卷无论多么波澜壮阔,都是具体的科举人物在实践活动中一笔一笔绘就的,要溯源理论化的科举思想与体系化的科举制度,洞察它们的运转情形与作用机制,离不开对科举交往活动的探赜。

为实现科举交往史的研究旨趣,需要在网络搭建、史料搜集、明晰问题、方法选取、语言表述等方面研精毕智,同时也要注意以下两对关系的融通。第一,精英人物与普通人物的关系。科举交往史研究虽然强调视野下移至普通科举士子,但并不意味着忽视科举精英人物的交往活动,只是要改变以往科举研究中过于关注精英人物的做法。事实上,二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因为众多精英人物正是凭借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后才实现身份转换。而且,二者的交往活动既体现出各自的特征,又存在交叉的部分,因此,应通过“双向审视”,将他们的科举交往活动置于较为合理的分析架构中解释历史,既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科举交往活动,又关注重大事件中的科举交往活动,防止走向极端。第二,具体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科举交往史研究离不开对具体交往活动的描述,但如果落入琐碎叙事的窠臼,未能解释科举交往活动背后的深层动因、现实影响及价值意蕴,便会出现研究对象碎片化和研究意义缺失等问题。故而,需要考虑人物的生活背景与社会现状,采用总体性审视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科举交往活动进行细致分析,在深入挖掘交往细节的基础上,全面把握科举人物的时代境遇,通过窥探不同个体生命的“闪烁”,透视整个社会璀璨的“星空”,更好地理解具体交往活动派生出的“宏观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的总和问题”。^② 综而观之,无论出于完善科举学体系的目的,还是回应当今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科举交往史研究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应得到学界的更多重视。

(作者赵凯,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邮编:310058)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① 刘海峰:《科举学三十年:一门方兴未艾的专学》,《科举学论丛》2022年第2辑。

② 让-伊夫·葛涅:《史书编撰与1980年以来的变革》,韦邀宇译,端木美审译,《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SUMMARY OF ARTICLES

Continuing Tradition and Learning from Oversea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in China // Li Xiaodong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China lies in the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exploring ancient times based on epigraphy (known as “*Jinshi fanggu*”), borrowing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methods from overseas, and integrating them with the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modern times, Chinese scholars, while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Jinshi fanggu* that emerged in the Yuan Dynasty, conducted field surveys on various remains. In order to refute the theory of “Sino-Babylonianism”, they learned from overseas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methods for prehistoric relics.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law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Marxist historians and archaeologists joint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i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self-development,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and creating new situations, interpreting the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 Bottom-up Study through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 Zhao Kai

The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 study focused on the history related to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represent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origin, it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ctivities, as well as an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research into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reflects a strong humanistic focus. It begins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lorful world” from the “specific figures” with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human life. Not only does it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perfect the research paradigm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studies, but it also facilitates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reality,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oday’s society. To study the interactiv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return to the “field” form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ed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stablish the macro-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we should prioritize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learn from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In terms of language expression, we should adopt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With increas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ill become a rapidly developing academic growth point in studi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cholars in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and Their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the Unity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 Cui Qinghe

Scholars in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ha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each with its own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theory was not only a discussion about the superiority of classics or history, but also related to academic methods and ideological agendas, involving key issues such as the unity of monarchs and teachers, the use of history to elucidate the D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ao,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traditions. The theory of “affinity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proposed by the textual scholar Qian Daxin was actually still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studying history to seek the Dao. The core of Cui Shu’s theory of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cs and history” was twofold, —the conviction that Six Classics were the vehicle of the Dao and the belief in Confucius’ idea to govern the world through learning. The theory of “history without classics” by litterateur Yuan Mei argued for the unity of literature and the Dao and the freedom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Zhang Xuecheng advocated that “the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es”, and the true concern was the unity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e divergent opinions of different scholars at the same period provoked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unity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at that time, foreshadowing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theory in later generations.

Magyar Lajos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Republican China // Li Ziqiang

The theory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scholarship, and so was Magyar, who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is debate. Despite diverse responses to Magyar’s theory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Chinese scholars had gradually formed a more homogeneous and stereotypical view on the issue. The main flaw in Magyar’s thesis lies in its disloc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and its detachment from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through criticizing his theory, Marxist scholars in China had reflected